

# 侯仁之

陈光中 著



# 侯仁之

陈光中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仁之/陈光中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2

ISBN 7-108-02338-5

I.侯… II.陈… III.侯仁之一传记

IV.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4826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刘蓉林

装帧设计 罗洪 薛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图 148幅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9.00元

- 自序 —— 1
- 一 人生之始 —— 7
- 二 走进燕园 —— 17
- 三 投师名门 —— 29
- 四 从历史迈向地理 —— 43
- 五 国难当头 —— 57
- 六 身陷囹圄 —— 69
- 七 牢狱外仍是牢狱 —— 81
- 八 流寓津门 —— 93
- 九 远赴英伦 —— 105
- 十 亲尝教炙 —— 117
- 十一 重返燕园 —— 135

- 十二 开拓新学——145
- 十三 学以致用——157
- 十四 第二次大劫难——175
- 十五 从“黑帮大院”到江西鲤鱼洲——189
- 十六 重新开始学术研究——205
- 十七 老骥犹有千里志——219
- 十八 中国“申遗”第一人——239
- 十九 钟情北京——261
- 二十 心系燕园——287
- 二十一 “名利于我如浮云”——305
- 侯仁之年谱简编——321
- 后记——327
- 插图索引——340

# 自序

这篇序文，本是想请我的朋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萧东发先生写的。

几年前，我由他所引，第一次前往燕南园61号拜访侯仁之先生。萧先生对我说：“你应当写写侯先生。”经他鼓励，如今终得书成，这其中的经过，他最了解，请他写序，应是最为合适的。交往多年，实为知心好友，若是提出请求，想必不会拒绝。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读到60年前洪业先生写给侯仁之的一封信，深为感触。此事已在书中有所叙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天津工商学院决定出版侯先生的《天津聚落之起源》，他十分高兴，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洪业先生，请其作序，洪先生当即回信，居然拒绝所请。信中称：“廿余年来，友好以著作来命作序文者，无虑数十起，业辄逊谢，弗敢执笔。……吾读书但恐无成，倘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又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亦不敢为朋友文字作序耳。”随后侃侃列举古人著书之序，虽风格内容各有不同，“然其有一贯相同者，一律则自己之著作，自己为之序……未见有书成自我，序出友朋，借彼吹嘘，发此幽潜者也”。

对于近世标榜之风日盛的现象，洪业先生深恶痛绝：“甚矣，此风之不可不革也！”

洪业先生从不请人为自己的著述作序，自己也从不为他人作序，原因很简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当无待于外序，实无益于书”。

有洪先生如此言论在，我这本书的“序”，是断然不敢请别人作了！

“序”无定法。如洪业先生所言：“……或仅为目录纲要，或仅注意校讎完阙，或复纵论古今著述，或并兼道家人身世，亦自不必一律。”像顾颉刚的《古史辨》，序文竟长达百页；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为三十万言的长篇回忆录，实为“人生之序”，而非“著作之序”了。

我未曾想、也写不得如此的长序，倒是有些话，想与我的读者谈谈。

这本书，写的是一位学者，一段历史，一门学问。

这学者，自然是侯仁之先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侯先生是长寿之人。出生于辛亥之年，历战争之磨难，经运动之坎坷，始终坚持在科学之路上的艰苦跋涉，而成为一代学术巨擘，那独特的经历，实在是有些值得追寻探究的地方。

说来也许有些不敬。许多传记中的名人，往往被誉为“自小聪慧过人”的天才，但我认为侯先生不是。侯先生幼时体弱，竟至几度中断学业。若不是慈爱智慧的母亲教子有方，也许难以成才。至于他后来如何成就大业，书中自有介绍，此处无需赘述。但若考究其根本，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本人独有的个性。假如仅限用两个字概括，那应当是——坚韧。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先生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光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先生一生都在不停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95年的人生轨迹，与百年来国家、民族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那其中会有多少动人、感人的故事！对于历史背景的介绍，自然应当成为本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身为作者，我更关注的是“长跑”的过程：他在这漫长的路途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让我无奈而感动的，是每次认真的交谈，最后往往都变换了方向。在不知不觉间，话题就转到了他的那些老师身上：“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这是他常说的话。

说来是巧，在侯仁之每个人生的转折点，都有一位老师陪伴着他：顾颉刚老师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使他决定放弃学医改攻历史，从而进入燕京大学；洪业老师“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肺腑之言，使他从历史走向地理；远赴英伦投至达比教授门下求学，又使他终于迈进历史地理学的大门……当然，还有司徒雷登校长呢，还有夏仁德教授呢，还有冰心先生呢，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呢……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自然不仅仅局限于学业，更有思想与精神上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情：侯先生被日寇判刑后暂居天津，因意外情况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正当他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洪业先生带话过来：不能走！就是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为什么而死的”！——洪先生自己就是榜样：在日寇的监狱里，他不仅自己恪守气节，还教诲身边的学生要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正是在这些贤师的引领与鞭策下，侯仁之才逐渐走向成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得起名利的诱惑，扛得住命运的播弄，挨得过长久的寂寞，以坚韧的精神求学治教，最终不仅成为学术泰斗，还成为后辈学子崇敬的楷模。在一代代杰出的学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

说到学问，侯仁之的名字是与历史地理学紧密相连的。作为这门特殊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侯先生在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实践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具体方面都倾注了极多心血，并取得了卓著成果。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内容精深、理论严谨的科学，要想深入系统而且通俗易懂地介绍这门学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情。我既不是侯先生的学生，此前对历史地理学也一无所知，是彻底的外行。为了克服这一严重缺陷，我使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进行自学。对我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既艰苦又愉快的。说它艰苦，是因为不仅要正确理解侯先生本人的学术思想，还要了解学界各种不同的观点，否则，便不足以全面掌握这门学科的状况。不过，受学力所限，对此我也许仅能做到囫圇吞枣、一知半解而已。若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严重谬误，错误的责任自然应当由我负，只希望读者不致被谬误所累，而能正确理解侯先生的学术思想。

而那学习的愉快，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我逐渐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之后，突然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一个新奇而广阔的天地！如果换一种眼光——历史地理学的眼光——去观察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会发现每一件原本平淡无奇的事物都蕴藏着极为诱人的灿烂光辉。那密林葱郁的冈峦，也许曾是幽深海水下的一堆礁石，是造化之功赋予它如今奇妙的风采；那荒蛮可怖的大漠，也许曾是广袤的良田，是上天的无情摧残加上人们贪婪的掠夺，使昔日的风光为黄沙所掩埋……历史地理学的任务，用达比教授的话来说，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用侯仁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原它原来的面目”。这含义都是一样的。举一个未必适当的例子：从街头那弯腰弓背蹒跚而行的老妇身上寻找并复原她青春少女时期曼妙的身影，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眼里，一处干涸的沟壑、一截残墙的遗址、一座峻峭的山崖、一段废弃的古道……都具有可供深究的丰富内涵。因此，如我在书中所写：“我还是下决心大胆地尝试一下，力求使用虽显浅薄但比较通俗的语言，以引领读者和我一起轻轻揭开遮挡着那个美丽世界的帷幔，看看侯仁之以及许多像他一样勤奋的耕耘者们是如何通过艰辛的劳作，在科学的沃土上栽培出历史地理学这株璀璨的奇葩。”“做学问”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只要深入进去，其中自有无穷乐趣。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这本书而对历史地理学开始产生兴趣，那真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这本书的写法，也许并不符合一般“传记”的规矩，它更像一个长篇的“对话”：是我以一个作者的身份，与侯先生的文章对话，与侯先生的学问对

话，与侯先生的心灵对话。当然，更重要的是与侯先生本人对话。实事求是地说，侯先生并不喜欢写自己，他一再说，希望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笔墨”，而应当去写那些“真正了不起的人”。此前曾有人想要为他写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当然，在耄耋之年，能有人帮他回忆、整理那些散失的往事，他还是感到宽慰、感到高兴的。三年来，在燕南园61号那小小的客厅里，我曾数十次与他对坐长谈。感谢侯先生的信任，向我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使我得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说，在刚开始采访的时候，我还多是出于好奇和崇敬，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演化为一种平和的感动。侯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也力求用一种平凡的语言来写这本书，以抒发我的感动。我还使用了一个最平凡的方式命名这本书：它写的就是“平凡的人”——《侯仁之》。更要感谢侯先生，在我坚持的请求下，为我题写了书名。

书中配有一百四十八幅照片与插图，其中四十幅照片由侯先生及其家人提供、十数幅插图取自侯先生的著作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侯先生自己保存的照片所余甚少，现有的这些，无疑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弥补缺憾，我尽可能自己多拍一些照片，以反映侯先生所去过、所提到的那些地方。为此，曾三至天津，一去江西，两赴张家口，其间的感受还是蛮多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许多地方是去不了的，这也只能留作遗憾了。

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计岁习惯，今年应当是侯先生的“九五之寿”。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全力以赴及时出版，使这本书能够成为我献给侯先生的寿诞礼物。——一个人的生命有长短，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因此，我想节引61年前侯仁之先生为天津工商学院1944年毕业生写下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短序的结语，送给本书的读者：

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陈光中

2005年8月于北京会城门



# 一 人生之始

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  
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先母订画报启蒙；  
少年求学辗转，先德州博文中学，  
后济南齐鲁大学附中，再通州潞河中学……

——侯仁之，《晚晴集》自序

1911年，为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月10日，由革命党人发起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敲响了封建王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就在革命烽烟迅速地在神州大地四处燃起的时候，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镇上，一个男孩子悄然出生了。

那是1911年12月6日，侯仁之出生于隶属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这里离他的祖籍所在地——山东恩县庞庄并不太远。

顺便说一句，恩县历史悠久，因农业发达而著称。至明清时，因其“棉绒细软洁白，为近州县之冠”，而成为声名远播的富饶之地。不过，作为一个行政辖区，它的隶属关系曾有多次变革。远的不说，在1952年以前，它属于河北省，那年10月，因省界调整，恩县划归山东。而到了1956年，山东省一下子撤销了24个县，恩县也在其中，它原有的辖区分别划归如今的平原、夏津和武城三个县。因此，现在的中国地图册上，已经没有“恩县”这个地名了。

有趣的是，如果通过网络查一下“恩县”，会发现列出的相关条目并不少，竟有一千多条！而其中不少内容，居然是归属在“侯仁之”名下的。一个消失多年的县名，竟会因为是一位名人的祖籍得以留存，这也应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侯仁之写过许多回忆自己人生历程的文章，但是却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和家庭。对于读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根据一些极为简单的文字资料可知，侯仁之的父亲毕业于协和大学，在肖张镇上一所教会学校中担任教职。他的母亲没有正式上过学，她的父亲教她学会了识字读书。侯仁之于1918年入小学读书，那年刚刚7岁。由于他从小体弱多病，曾经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旧约》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没有荒废。父亲工作忙碌，在侯仁之的教育过程中，母亲始终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侯仁之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叫侯硕之。母亲一直注意培养他们自立生活的意识和参加劳动的习惯。他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兄弟俩自己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

1926

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带劲了。这些，为他俩以后独自去外地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15岁的侯仁之到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初次接触外面的世界，任何事情都让他感到新奇和兴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一大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年一代。那时的侯仁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不少书。他还记得，刚上初中的时候，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同学得到一本新书，是那同学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哥哥寄来的，书名叫《超人》，作者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女作家冰心。侯仁之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了。那是他离家第一年所读到的第一篇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侯仁之自己所说：“它好像忽然把我引入到一个心灵中所能亲切感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了我广泛涉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作品……”他后来所写的许多文章——包括学术著作，文笔都很优美，如同一篇篇抒情散文，这与他少年时代所受到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侯仁之当时完全不会想到，后来自己竟会与这位了不起的女作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已经是一个挺活跃的学生了。博文中学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学生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比赛。侯仁之很羡慕，壮着胆子找到篮球队长，想加入球队。可那时候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和那些人高马大的篮球队员站在一起，实在太不相称了，因此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侯仁之赌了一口气，干脆自己练跑步。每天下午课后，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坚持跑了一冬天，天天不间断。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了，班上同学找到他，说：“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1500米，怎么样？”他吃了一惊，说：“我怎么能长跑？我从来没跑过！”同学说：“你当然能跑！我们看见你天天在操场上练来着。”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1500米。比赛时，发令枪一响，他拼命往前冲。操场的跑道一圈是400米，跑过一圈，转弯的时候他挺奇

怪：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回头一看，原来其他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除了跑步，侯仁之还积极地参加各种课余活动。初二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话剧演出，那出话剧叫《山河泪》，看这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侯仁之很兴奋地讲给母亲听，母亲非常高兴，大大地夸赞了他一番。侯仁之很受鼓舞，居然根据小时候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自己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基甸救国》，那是他第一次尝试文学创作。

初三时，侯仁之参加全校演讲比赛，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兴奋地写信告诉母亲。母亲高兴极了，她对侯仁之说：“如果有一天你能站在讲坛上讲课，我坐在最后一排听也心里高兴！”

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他怀着悲痛前往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继续学习。齐鲁大学是当时中国13所有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父亲让侯仁之到齐鲁大学的附属高中读书，是打算让他将来能到医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当时学潮迭起，侯仁之学业中断，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州博文中学读高中。

不久，侯仁之的命运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折。

由于博文中学尚未在中国教育部门注册，学生不能直接报考大学。因此，侯仁之的父亲便安排他们兄弟俩去天津，到另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新学中学读书。

新学中学所在地原为“养正学堂”，始建于1864年。1902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得到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资助，在养正学堂的校址上创办了“新学书院”。1929年教育部对全国私立学校进行注册，因为新学书院不具备大学的规模，便改为“新学中学”。

侯仁之还记得，主持面试的是一位名叫埃里克·利迪尔的英国老师。

当时他并不知道，埃里克·利迪尔曾是一位著名的运动员。1924年利迪尔在巴黎参加第八届奥运会，以47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奥运会记录，夺得该项目的金牌。1925年，利迪尔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毅然返回他

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执教。后来，侯仁之和弟弟一起看了一部电影，这才知道利迪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部电影的中文名是《烈火战车》，说的就是利迪尔成为奥运会冠军的故事。

面试结果，侯硕之顺利录取，侯仁之却落选了。落选的原因之一，是侯硕之的英语水平好于哥哥；另一个原因，则是侯仁之有意“应付”——他对博文中学感情很深，实在不想离开。

不过，继续留在博文中学显然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1931年夏末，为了实现让儿子将来当医生的愿望，父亲将侯仁之送到河北省的通县，进入另一所很好的中学。他在这里再读一年高中，便可以报考大学了。

那是侯仁之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是叫“北平”）。他记得很清楚，火车停在前门东车站——那西洋风格的火车站如今仍然矗立在那里，与雄伟的前门遥遥相对。当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带有浓郁异域情调的车站钟楼、飞檐凌空气势壮观的前门城楼、造型独特且带有欧式装饰的箭楼，还有高阔浑厚的古城墙，都被金黄色的夕阳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他的心里激动极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与这座古老的都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过，他的新学校远在京城东面的通县，从前门到那里还有40里路呢。

“通县”如今已经改名为“通州”，成为北京属下的一个行政区，但在20世纪30年代，尚属河北省所辖。说到通县，历史相当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年便已建县，称“路县”。至东汉时改称“潞县”。本是一条“路”，后来却特地加上了“水”，变成了“水路”，可见“水”在通县的发展历史中极为重要。事实也确实如此。秦朝军队曾利用流经此地的白河作为水道向北部边关输送粮草；隋朝开通的大运河贯通南北，恰从通县（当时仍称“潞县”）境内穿过，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到了金朝，“潞县”改名为“通州”，要的就是“漕运亨通”的意思。通州借水陆交通之便，很快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商埠，竟有“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美誉。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它改为“通县”；再后来，时“州”时“县”多次变换，但一个“通”字总是固定不变。

侯仁之就读的那所学校，名为“潞河中学”。其名字的来由一是取自通县的古名“潞”，一是取自了不起的大运河。融古通今，颇有些深意。



这潞河中学可算是一所很有名气的老学校了，它是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会创建的。刚开始的时候，叫做“八境神学院”，这是通州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学校。

19世纪90年代，八境神学院改为“潞河书院”。后来又改为“协和书院”，并附设中斋，叫做“协和中斋”（“中斋”就是中学的意思）。1900年“庚子之乱”，通州协和书院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得到恢复，规模倒扩大了不少，重建了教学楼、学生宿舍等一批很好的建筑。1911年前后，基督教公会、伦敦会、长老会协商决定联合办学，原协和书院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由美国牧师高厚德任校长。到了1917年，华北协和大学的大学部迁至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至1919年，组成燕京大学。

关于燕京大学成立的经过，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将留待后面慢慢叙述。在这里要说的是，华北协和大学虽然将大学部迁走了，但它的“中斋部”仍然留在通州，改为“私立潞河中学”。华北协和大学的场地和建筑物，都拨给了潞河中学。

1931年那个晴朗的秋日，未满20岁的侯仁之在一片蝉鸣声中走进了绿树浓荫的潞河中学校园。

此时的侯仁之，不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乡下孩子，而是长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英俊青年，他对新学校充满了好奇。尽管这些年来他所就读的多是条件较为优越的教会学校，但潞河中学那宽阔整洁的校园、碧水荡漾的小湖、风格独特的校舍、高大明亮的教室……仍让他赞叹不已。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令人倾羨的校园环境并不是最让人兴奋的。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极其值得信任和敬爱的良师——校长陈昌佑先生。

若从最早的“八境神学院”算起，直到“潞河中学”定名，这所学校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名字也几经变换，而校长的更迭却并不频繁。第一任校长谢卫楼，主持校政的时间长达三十多年，后来成为华北协大学校长，其后则由美国牧师高厚德、田和瑞相继任校长。1919年，一位中国人被任命为副校长，他就是陈昌佑。

陈昌佑字众良，1892年生。他祖籍原本是浙江绍兴，很小的时候便迁居